

广西史学者研究文集

史烛集

陆炬烈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年·北京

作者简介

陆炬烈,1942年12月生,广西武鸣县人,壮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为广西民族学院干训部主任,副教授;广西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曾主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多门课程,出版《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一书,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革命史常用词典》、《中国近代军阀史词典》、《陆荣廷新论》、《壮族通史》、《解放军烈士传》、《广西将领传》等书的撰稿工作,主笔《广西历史人物传》,共八辑。

总 序

·徐方治·

由《史海拾贝集》、《史墨集》、《史林学步集》、《史烛集》组成的《广西史学者研究文集》的作者吴忠才、陈欣德、庾新顺、陆炬烈同志，他们都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特别是广西地方近现代史和党史的研究工作，本文集是他们在此学科领域中长期辛勤耕耘的成果。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从落后、屈辱走向变革、发展的历程，广西是这一伟大变革、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广西近现代社会革命和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它的发展规律，总结斗争和发展经验，是史学界、理论界的历史任务。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真正动力。广西地处南疆，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其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就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本文集的作者们首先是努力正确反映和着重论述了广西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历史发展，着重阐释了各族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如《史林学步集》、《史烛集》中较系统地反映了广西特别是东兰地区的农民运动发展问题，《史海拾贝集》和《史烛集》对广西人民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和红军长征中的作用问题也作了较翔实的反映。同时对广西农民运动从自发到自觉、合法斗争形式与武装斗争形式相结合、阶级斗争与民族团结相统一，以及鲜明突出的直接反帝特点等，都作了很有创意的论述和概括。文集的有关这些方面，又为广西近现代的人民史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也是广西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广西地方组织,在广西伟大变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尽管遭遇到了各种困难险阻,但党总是能从全国和广西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把握其发展变化特点,及时作出相适应的决策,并动用了正确的谋略艺术,领导各族人民去夺取预期的胜利。本文集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党及其领袖和一大批杰出代表人物在领导广西人民革命和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伟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如《史墨集》中较集中地论述了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广西人民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如《史海拾贝集》、《史林学步集》、《史烛集》中关于百色和龙州起义的战略策略、“劳五暴动”决策和党与桂系的统一战线特点问题的阐释,文集关于党的民族政策在广西的实践和创造的论述等,都很有意义和深度。

本文集的有关篇章,还努力探讨了近现代广西旧统治阶级领导集团的发展特点、方略及其发展中的环境因素,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他们一定的历史进步方面和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如《史烛集》中关于旧桂系陆荣廷建省会于南宁对广西民主革命和广西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意义及历史作用;如《史海拾贝集》、《史烛集》中有关篇章在对新桂系的抗战方略及其在抗战期间与党和人民军队关系问题的论述中,既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新桂系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定地位和积极作用,分析了它的抗日方略与实践活动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方面,又探讨了 this 集团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演变的规律。这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精神是可贵的。

总之,文集的作者们,在回顾和总结党在认识、把握广西近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进行决策去实现变革目标的探索、实践和成功经验的历史发展中,在反映广西各族人民的伟大斗争实践历史进程中,他们努力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向,特别是紧密联系广西历史发展的特点,并力求运用史论结合原

则,多方面、多层次地探讨了本学科特别是广西地方史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一些探索是很具有创意的,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和新的进展。他们的研究,还涉及到政治学、政策学和党的建设理论等更广泛领域。可以说,本文集在理论上、学术上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它是史学特别是广西史学学术丛中灿烂锦团的一簇,是地方史研究方面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

当然,广西中共党史、近现代史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本文集提供的成果也只是这个领域中的一部分,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还需要作者们与史学界、学术理论界广大同仁的共同努力,以期取得更大的发展的成就。

2000年10月
于广西南宁

广西史学者研究文集

总 目 录

- (一) 史海拾贝集 吴忠才著
- (二) 史墨集 陈欣德著
- (三) 史林学步集 庾新顺著
- (四) 史烛集 陆炬烈著

目 录

人间天国祭

- 纪念太平天国起义 140 周年 (1)
- 石达开部回师广西后的离散及其原因 (16)
- 太平天国北伐将领林凤翔 李开芳 (29)
- 太平天国后期主将陈玉成 (39)
- 桂林大本营时期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伟大转变 (53)
- 壮族文人的形成及其近代思想演变 (77)
- 东兰农民运动的起因及其特点 (91)
- 右江党组织的创始人和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余少杰 (104)
- 壮、瑶各族人民对右江革命的贡献 (120)
- 壮族中将韦杰传 (131)
- 广西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重要贡献 (151)
- 香港回归与广西近代屈辱史的洗雪 (155)
- 桂系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壮族地区的统治 (158)
- 陆荣廷建广西省会于南宁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209)
- 论新桂系的抗战方略及其实践 (230)
- 从貌合神离到相煎皖南
- 新桂系与新四军关系述评 (244)
- 坐断江南战未休
- 试析项英向党中央请求撤职 (257)
-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显著特点 (273)
- 世纪之交精神文明建设的灯塔 (284)

韦敬辨.....	(290)
契嵩.....	(293)
朱杞孙与蓬莱洲城碑	
——附：莫乃群、胡华、尚钺的信	(298)
吕璜.....	(309)
彭昱尧.....	(316)
跋.....	(321)

人间天国祭

——纪念太平天国起义 140 周年

爆发于广西桂平，有汉、壮、瑶等民族广泛参加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 140 周年了。坚持 14 年农民政权，势力波及大半个中国，其北伐前锋已进抵天津独流，北京海淀、前门，使清朝摇摇欲坠的太平天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和封建统治清王朝的联合进攻下，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多么令人遗憾！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顶峰，它把宋朝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均贫富”，明朝李自成起义的“均田免粮”口号纲领化。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喊出了中国农民粉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呼声，而且勾画出了中国农民世代所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国美丽图景。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把社会发展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并以太平世为最理想的境界。《礼记·礼运》篇对太平世更进一步解释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即世界大同。并说“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是“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这些至理名言，为多少代的中国人所折腰。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鸦片战争的震撼下，为把“太平”、“大同”付诸实践，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至今想起他们，我们无不感到万分的崇敬。但是，他们毕竟是失败了。每当我们在缅怀他们历史功绩的时候，也在追寻着他们的奋斗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和思考。作为太平天国发祥地的广西各族人民，让我们面对稔熟的紫荆山，三鞠躬！

—

中国历来是一个不乏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国度。在资本主义自

由竞争引起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不少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鸦片战争失败后,洪秀全可谓是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人。

洪秀全的出现决非偶然,他是时代“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宠儿。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既读四书五经,又博览各种奇杂书籍;既执鞭教化蒙童,又下田干农活,深知社会的腐败和农民的疾苦,算是个离经叛道的乡村知识分子。从16岁到30岁,他4次赴广州应试,希图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然而总是名落孙山,连个秀才也混不上。这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曾经大病一场,说了一连串别人无法理解的昏话。

幻想的破灭,使他逐步面向现实。当时的广东,是禁烟斗争很激烈的地区,同时也是天地会斗争连绵不断的地方。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对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他赞扬天地会的反清精神,但又不拘同于他们的复明主张,说明他对历来的农民斗争是有审慎态度的。他每与人议论时政,常常慷慨激昂,悲叹国中无人,以致受“鞑妖”所奴役。在谈到外侮内患时,他竟拍案而起:“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①说着竟涕泪纵横,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他的革命意识逐步明确。但是,如何唤醒民心,广结民众,以致“风云聚会”?他苦思冥想,找不到什么可以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一个偶然的机,使他想起了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得到的一本奇书《劝世良言》。这是一个叫梁发的肇庆人,为英国伦敦传教会编写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书中说,上天的独一真神是上帝,此外再无别的神。上帝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是造天造地造万物的大主宰,是人间一切荣华富贵的赐予者。后来他经常出入广州的礼拜堂,在罗孝全的指导下仔细研读《圣经》,从救国的目的出发,对它的“合理”成分

加以选择取舍。于是他把西洋的上帝与中国古代的上帝联系起来。他熟读儒家经书,当然有这个功夫。他从《诗经》、《书经》、《易经》乃至孔孟的论著中,找出了许多有关“上帝”的说法及其事迹,比如“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之类。认为中国古代也崇拜上帝,中外一理,只是因为“番国”崇拜到底,所以发达领世界之冠。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人间君王竟僭占称帝,把上帝撇在一旁,从此走入鬼路,以致被淫妖所捉弄,被洋夷所欺侮。这样,洪秀全中西合璧的拜上帝理论便逐步形成了。

洪秀全的拜上帝理论,集中体现于1845—1846年间他所写就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中。他从农民的平等观念出发,认为“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都是赖上帝“一元之气”所化生的“赤子”,本是和睦共处的。只是到了后来,由于有“阎罗妖”、“老蛇妖鬼”之类,在佛的掩护下注人生死,摄人灵魂,颯然称帝,把人们“缠捉磨害”,才造成了凡间的种种苦难。因此,对于凡间皇帝,“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②只有这样,死后才能魂升天堂。他进一步指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否则就是对上帝的极大冒犯,就要受到“天条”的严厉惩罚。这实际上是对封建神权和封建皇权的大胆挑战 and 彻底否定。它要以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权威无比,并在西方显灵上千年、几百年的天上皇帝,来杀戮中国大地上享有至高无上特权的世袭皇帝,荡平人吃人的封建等级制度。他还指出,中国正处在“极暗”、“极乱”的时代,彼国憎此国,此姓憎彼姓,彼人憎此人,“尔吞我并”,“陵夺斗杀”。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出于私”。所以必须尊崇万能的上帝,奋起相救,使“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以实现人人饱暖,个个幸福的“大同”世界。为“挽已倒之狂澜,摧毁乖漓浇薄之世界”,大家必须跳出“邪恶之鬼门”,勇作“中流之砥柱”。只有这样,才能“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夜退日升”。这既充满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又鼓舞人们斗争必

胜的信心。如何斗争？就是对阎罗妖、邪魔、蛇鬼之类必须“击灭之”，采取暴力手段，推翻极权的统治。应该说，这些理论在近代的 中国，是有争独立、争人权、争平等的进步意义的。在当时，提出这样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理论，对于那些迷信“天命”，希望有一个好皇帝来搭救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折射式的启蒙。

在拜上帝理论形成的过程中，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冯云山、洪仁玕是最早参加拜上帝教的积极分子，他们为拜上帝教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拜上帝教在当时封建统治比较牢固，同时又为列强所钳控的广东无法立足，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来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广西桂平紫荆山区。苦于地主阶级团练压迫的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从这两位教书先生那里找到了救命之星。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先后成了拜上帝教的核心人物。

拜上帝教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以及元末清中的白莲教一样，都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所不同的是，它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身受外国列强和国内封建势力以及满族贵族的多重压迫，故其革命更富于斗争性和理想性。它把古代的大同思想与现实世界以强侵弱凌杀斗夺相比较，激发人们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憎恨和对平等天国的热切追求。同时，它以盛行于西方的基督教为蓝本，以中国当时的苦难为大背景，所以较有理论性和现实性。它虽然仍以宗教的形式出现，但用的是影响较大的西洋宗教而不是日趋没落的民间宗教，所以使人们有耳目一新之感，易于趋集和接受。还有，它是推崇上帝反对皇帝，主张一神论反对多神崇拜的，所以有顽强的排他性和向心力。人们只要加入拜上帝教，就举家同往，舍弃私产，生死相扶，义无反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上帝和天国。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专一化，是以往的农民反抗斗争所没有的。所有这些特点，都表明拜上帝教同历史上农民起义借用的宗教本质上既是一样的，但在理论形态及号召力

方面,又是以往所不及的。即使这样,植根于农民阶级的拜上帝教,由于缺乏先进的经济基础、科学的世界观和明确的阶级意识,所以它只能成为农民的革命组织,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近代化目标的政治团体。

正像乡下人从城里买到廉价的鸟铳而自认是好武器一样,洪秀全笃信他从繁荣的西方那里弄来的基督教义,只要与中国的民间宗教和儒家道统揉和起来;便可以铸成拯民于倒悬的利剑。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洪秀全以拜上帝教来发动和领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并非盲目之举。

洪秀全之所以用拜上帝教来发动太平天国革命,首先是因为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后,封建的中华帝国迅速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使中国尤其是两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蓬勃发展,到处山堂林立,会党丛生。但是,他们的斗争意识都比较落后,仍以前代的“反清复明”口号为号召。拜魔发誓,刀加其颈的人伙仪式,也过于愚昧荒唐。虽然他们往往饥则蜂起,饱则远扬,啸众自雄,席卷千里,但由于观念陈旧,是所谓“回过头来干革命”,“复明”的目的不过是想当个“米饭主”,所以纪律松散,往往扰害良民,总没有好结果。如 1848 年广西镇安府黄天送、黄雄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1850 年武宣陈亚贵领导的农民起义,都曾震动一方一隅,然而终归未能成为大气候。有鉴于此,洪秀全不得不另辟蹊径,创造出一种新式的思想和团体来领导农民的斗争。大家知道,中国农民由于经济地位低下而文化水准不高,千百年来都是在神权的统治下过来的。他们供奉社王、雷王、家祖、佛龛等各种神祇,随时随地都希望有什么神灵显圣,以求得经济、政治及文化上的解放。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洪秀全,深知“受命于天”、“应运而生”以及民间“降童”之类的神话,所以他决心引来西方的基督,自己充当救世主耶稣的代言人,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再者,也许有人会说,早在 19 世纪初期,圣西门、欧文、

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已颇盛行,这些乌托邦的思想也很容易使小生产者农民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刺激;作为一种思潮,也是够时髦的,为什么洪秀他不接受这些而去与耶稣基督握手?这要看二者的不同。空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它虽然也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公平合理的社会,但反对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这就不符合当时已经处处烽烟的中国农民战争环境。而且这种幼稚的无产阶级思想,当时不可能随着资本主义的侵略来到中国,因为它是与资本主义敌对的思想体系。而基督教就不同了。它虽然是公元1世纪在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产生的人为宗教,是反对罗马奴隶制的哀音。但它的革命因素以及耶稣拯救贫苦人民,教人忍受苦难,死后升入天堂的幻想和安慰,不仅可以成为统治阶级压迫和麻醉人民的工具和精神鸦片,而且也可以成为劳动人民反对压迫剥削,争取自身解放的一种精神依托,成为一种可以拐个弯拿来使用的斗争武器。正如恩格斯所说:“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蒙蔽读者是应该的”^③。洪秀全正是做了这种拐个弯拿来“蒙蔽读者”的事情。而当时的西方侵略者,也带来了基督教的文化侵略,正巧可以使洪秀全拐个弯拿来还治封建统治者和西方侵略者之身。还有,由于基督教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所以它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它通过耶稣牺牲自己永远为人类赎罪的概念,很“容易获得地盘”^④。基督教的这些特点,正是使洪秀全大加赞赏并决心采撷的地方。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中,赎病救人的故事屡有出现,代天兄耶稣下凡传言以团结人心挽救危局的事也不少,正好说明洪秀全从西方引进基督教是有他明确的用意的。

洪秀全的用意是以混血的拜上帝教鼓动农民反叛传统的宗教及其赖以存在的封建社会基础,“令全世之人归我”,从而顺势创立江山,实现他“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让自己来开科取士”的“悖

道”宏愿和“至尊老人”赐予“天王大道君王全”的梦托^⑤，以便于手握杀伐之权，斩邪留正，拯斯民于水火。这一“深远图为”的机密，对洪秀全、冯云山及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们来说是心照不宣的。至于像李秀成、陈玉成等这些后起之秀，以及浩浩荡荡的“觅食”的随从们，就不那么知悉或根本就茫无所知了。

二

1851年1月，太平天国革命终于爆发。它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坚持了11年的天京政权。这场革命的爆发，是近代中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其催化剂是鸦片战争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它的本质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只不过蒙上了一层宗教迷信的色彩而已。

金田起义爆发后，真刀真枪的厮杀已在眼前。农民们看到的已不是什么“妖鬼”，而是实实在在的敌人。这时，太平天国革命的宗教外壳就逐渐地剥落了。

请看进军中的《万大洪告示》摘抄：

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皆由于无道昏君，远君子，近小人，卖官鬻爵，压抑贤才，以臻利风日炽，上下交征。富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不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

再看摘抄的杨秀清《奉天讨胡檄》：

“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言之恻心，谈之污舌”。“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骨如莽”；“纵贪官污吏布满

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掩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道，豪杰绝望”；“甚至文武官员，贪图利禄，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今幸天运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甲冑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女女，搃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⑥

这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呐喊，既是旧时代的回声，又是新潮流的怒涛。洪秀全喊出了近代中国被压迫被迫剥削人民的共同心声。应该说，这是他们在反专制反侵略的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的体现。

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征战，自广西入两湖，自武汉下金陵，舳舻万艘，敝江而下，风扫残云，所向披靡。1853年3月，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天王洪秀全于年末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或说实践纲领。它与拜上帝教的理论纲领一脉相承，从经济、政治、文化乃至道德、宗教等方面，勾画了一个人间天国的形象。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民起义所没有过的，也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最高的峰巅，它要把农民们梦寐以求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付诸实践。

这是什么样的“天国”呢？我们从洪秀全奉“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意旨”所作的规划中，可以得出如下的概念：

它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本的国家，纲领以“田亩制度”的名目出现，便是证明。它规定田分九等，不论男妇，照口分田，好坏参半，归农民所有，以做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生产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的，收成除留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每25家设一国库，用于婚娶弥月喜事，并以之备兵荒。力农有赏，惰农有罚。为官者，凡犯“天条”，如滥保举人，滥奏贬诬人，怠慢圣书礼拜之类，

一律“黜为农”。“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彻底否定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是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的继承、发展和具体化。这不仅为历代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要求造成了实现的可能，而且为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它又是一个军政教合一的国家。它的社会组织，是以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总制、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军师、天王构成的，层层向上负责，主断权属天王，天王听命于子虚乌有的上帝。各级军职，不仅管军事，而且管政治，管宗教及文化教育。如“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统领之为兵，捕敌杀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把军事与生产结合起来，亦兵亦农。官员除管军事外，还管奖勤罚懒、赏忠惩奸、保举乡官、督察律令、处理民事、催科执刑、教化兵民等等。这种国家制度，摧毁了封建统治的各级政权，废弃了科举教育，使军政教诸权掌握在革命分子手中，权归于一。这种军事组织和作风，对于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是有积极负责、雷厉风行的作用的。

因为它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它到头来只能是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它没有否定小农经济的存在，也没有鼓励商品生产的发展。国库实行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这不仅超越了历史时代，而且实际上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另外，它只以国库为出入，不要交换和流通，这又是历史的倒退，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一超前，一后退，矛盾无法解决，最后只能又回到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去，此外别无他择。实际上，在江南一带，许多地方根本无法依照《天朝田亩制度》实行。太平军在天京城外设“买卖街”，杨秀清、石达开等提出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洪秀全朴素的农民意识逐渐淡化，因袭封建君主制度，宰制天下，养尊处优，用度无量，偏信亲族，严格等级，梦想建立一个“定天下于一尊”的洪氏王朝。“每岁一举”的选官制度，早已抛到九霄云外。